

戊戌时期容闳与维新派的若干关系

汪叔子



青年时代的容闳

容闳(1828—1912)，号纯甫(成甫)，广东香山南屏乡(今属珠海市)人。作为中华留美学生的爱国先驱，以及晚清“西学东渐”的著名代表，他的思想与实践，近年来已引起学术界日渐增多的关注。唯于戊戌维新时期容闳情形，诸书似犹述之欠详。兹据陋见所及的信札等史料，对甲午战后至庚子自立军起义，其时容闳与维新派的若干关系，试作考察。或者可于容氏生平研究与岭南维新史研究，略有裨补之用。倘其失当之处，谨盼方家指正为幸。

一、容闳与三湘新政

“三湘新政”，是戊戌维新在社会改革实践领域的最显著的成功榜样。

“三湘新政”在经济方面的重心所注，为湖南矿务总局。

容闳在湘省矿局开办伊始，即已发生联系。张通典光绪二十二年四月间致汪康年函，有曰：“惟来示述容成甫观察之言，有中国学生在美考得矿学上等凭据者，现敝局需才孔亟，此等学生方在延揽，顷面告右帅(按谓陈

点的国家，简直形同空白。有个别东方国家几乎毫无人知，它们的存在在一团迷雾中，若明若暗，似有似无。这也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批人不自量力——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认真“量”过了自己的“力”，倡议编纂这一套巨大空前的《东方文化集成》。虽然，我们目前的队伍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还不是太大，我们的基础还不是太雄厚，但是，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澜于既倒”，我们决非徒托空言。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老、中、青三结合，而对著作的要求则是高水平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既能提高中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又能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收得一举两得之效。

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预见，并不出于什么“主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东方几十个国家一视同仁。国家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历史不论久暂，地位不论轻重，我们都平等对待，决不抬高与贬低，拜倒与歧视。每一个东方国家都在我们丛中占有地位。但国家毕竟不同，资料毕竟多寡悬殊。我们也无法强求统一。有的国家占的篇幅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这是实事求是，与歧视毫无关联。

我们虔诚希望，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中国的两只眼睛都能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西方的一只眼睛能变成两只，也同样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世界上各个民族也都有了两只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我们共同学习，努力互相了解。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互相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宝箴,字佑铭),即令函托台端,代为招致。考得矿学上等者是何姓名、何省人?均乞查悉。如现在沪上(原注:如不在沪,并请面询容君,寄信代邀),即乞先生劝驾,促令即日来湘。薪水月百金,或百四十金,并请酌定,以便矿师能早启行,不必再函商也。”

矿局以后又一再催促,盼望极其殷切。邹代钧致汪康年,四月廿九日,函曰:“容成甫所言矿师,祈公早为物色请来,不胜盼望之至!薪水每月百金,或百余金、二百金,都所不惜。”五月十二日函云:“容成甫所荐之人,已由伯纯(按张通典字伯纯)函致执事代请来湘,偕否?祈早示知为盼。”然此事似并未能谐成,故而自六月份起,矿局又有了招致容闳之侄的计划。

邹代钧致汪康年书,六月十八日,曰:“此刻已请邝荣光(原注:开平矿师也)来湘主矿事,其本领与温姓人(按指温秉仁)等;唐月池且作罢论。惟邝荣光不能长留湘(原注:仍须回开平,可兼办湘事,不能专办湘事),须觅替人方好,公所言容成甫之侄,祈设法招致。若能招来,祈先示知,以便定薪水一切。”七月十九日函,又再叮嘱曰:“容侄,请留心图之。”七月二十五日,函中又曰:“容侄事,业经考功复公书详言之。刻下罗岳生十分居奇(原注:此人心术);祈公早催容侄来为盼。薪水就本领高下定之,多可每月二百金,能少更好,惟公裁定,此间断不计较,惟其人必须为我用耳。盘川由公垫发,多少惟公定可也。”

邹函所说到的“考功”,谓陈宝箴之子陈三立。陈三立在这一年(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致汪康年书,曰:“湘矿朕兆尚佳,容侄如化学、矿学有精诣,乞即为延订以来,薪水、盘费,惟公酌定。大约视技艺之优劣,酬俸资之高下,此间不斤斤较量也。”邹函所述“容侄事、业经考功复公书详言之”,即是指陈三立此节文字。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致汪康年书中,邹代钧再次为矿局技术人材事写道:“敝局化矿之人,至今未得佳者,前已托鹤笙(按即钟天纬)招陈石麟孝廉来湘(原注:已允来,尚未到),后因求贤馆需人,右帅以陈明化学、格致兼通算,即以陈主求贤馆席,而局中仍是无人,祈公商之陈次亮(按即陈炽)、容纯甫并博访通人,代谋一专精化矿者。如得其人,即恳缄示,即往返缄商薪水若干也。”

同函中,邹代钧还就湘省制造局拟办学堂觅延教师事,也请汪康年与陈炽、容闳谋商寻访;并告诉汪康年说,陈宝箴也已另有专信“缄托”陈炽、容闳。邹氏写道:“湘省现设制造局,系集商股购办。诸董事欲于制造局中设一学堂,拟招二三十小学生,常住局

中,俾学制造。欲延一人为之师,其人须通重学、汽机等事,俾日与诸生讲解制造之理,并随时入厂,观匠人制造,以期实事求是。务恳公细心访察为师之人,果有本领,月薪可百金内外。祈公与容纯甫、陈次亮谋之,缘右帅已缄托两人,欲钧再缄托公从容着力也。”

至光绪二十二年年末,又曾风传有容闳与陈炽入湘的消息。邹代钧于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至汪康年的信中,专条询问:“容纯甫、陈次亮都欲来湘,然否?”

“三湘新政”,“百废具举”之际,诸如矿务制造等类,皆急需精通西学之人。而人材难得,就象邝荣光,原职开平矿师,只能聘来“兼办湘事,不能专办湘事”;唐星球,则已为四川捷足先登而聘去;罗岳生则恃技婪索,有术无德,也不能“为我(维新派们)所用”。正是在这种“需才孔亟”的情势下,容闳主动通过汪康年向湘局推荐人材。

而从上引诸函,又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行“三湘新政”的维新人士们,上到陈宝箴,自下则陈三立、张通典、邹代钧等,对于容闳所荐人材以及“容侄”的来湘,甚至传闻容闳本人也欲来湘的消息,所表示的态度。这是对容闳的一种热切的期望与高度的信任。站在维新救国的立场上,他们始终把容闳视为亲密可靠的当然同志。

不仅“三湘新政”,而且其他地区,在维新的社会改革事业中,也都不约而同地纷纷想到容闳,盼望得到他的指点或帮助。如吴子光,贵州人。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自广东致书汪康年,说到“有黔人吴子光者,江湖异人也,前在广州城见之,属其来沪谒公(按谓汪康年),并有书与彼,令持谒复生(按谓谭嗣同)。此人已见否?若见之,可介之使见容纯甫也。”又如黄秉湘,四川人,欲办四川商务。往沪欲访容闳,吴德藩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自浙江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为之介绍曰:“前广丰令君黄楚枏同年秉湘,五大洲之有心人也,欲与容纯甫先生言商务大计,两君子(按谓汪梁)当极意赞画。”又如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初,有筹巨款以办全国新政之计划,亦荐举容闳忠信可任。《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曰:“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既与常熟(按谓翁同和)言,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

款。又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按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陈其璋奏《统筹全局、请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二月十七日,宋伯鲁奏《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此两折均奉旨“该衙门知道”)。枢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

二、维新派与容闳的银行铁路计划

容闳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着重进行的,是争取实现他的造铁路、办银行的计划。

汪大燮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九日致汪康年书中,深赞容闳的铁路条陈,说:“铁路,实以容闳条陈为最善,大致招美人统办通国铁路,并责令开设无数学堂,与以若干年限,限满中国收回,不贴钱。限内一切由官稽核,如有兵事先尽兵用。开办时华人有股多寡,均得附入。章程周密而妥善。人情竟不相属,奇哉!”

七月二十五日,邹代钧致汪康年函,亦论之,曰:“闻龙州铁路归法包修,东三省铁路归俄包修,均永不归还中国,信否?若果尔,俄、法管理铁路,即管理其地,无形之中,割东三省与俄,割龙州与法,不仅弃地,并自弃其自主之权。求英人所以待暹罗之道,尚不可得。国不亡于炮火,而亡于铁路,是又一古今创格矣!容纯甫之策最有识,右帅(按谓陈宝箴)已电告荣相(按谓荣禄),恳行容说,久不报,未知偕否?时局如此,奈何!”九月初七日,邹氏又有函,曰:“京信或不确,幸甚,否则,国亡于铁路矣,伤哉!次亮(按谓陈炽)致右丈(按谓陈宝箴)书亦如是言。右丈力保容成甫之说、于枢府,竟不用,奈何!容成甫条陈,公何不录入报(按谓《时务报》)中?”

汪大燮九月初二日,自京师致汪康年,笺中言及容闳入京请办银行事,曰:“容纯甫闳来京,户部电召办银行,近已散去回申,在虹口同文书局。其人据兄(按汪大燮自称)所见论洋务者最为朴实,曷与之一谈?兄与同居几半年,见其动作言谈,表里相符,非寻常出洋学生欺骗功名钱财者比也。”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汪大燮在致汪康年函中,愤慨地谈到容闳铁路、银行计划失败原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古之明训也。容纯甫尚在申否?徐晋斋来信言,彼闻盛杏孙(按即盛宣怀)得铁路、银行两事,颇以为奇,真不识‘时务’矣!渠在京时,荣大金吾(按谓荣禄)颇亲之,彼则畅所欲言,而荣亦称之,彼以为果亲己也,其实则见其上此条陈必非无资之人,亲之或有以俾我也。杨艺芳在京候简非

一日矣,忽报(按谓报效,即行贿也)荣,即见明效。天下事尚可为哉?”

容闳举办国家银行及“与美商纠集公司”(光绪二十二年容闳《铁路条陈》)兴筑全国铁路的计划既未成,又于光绪二十三年冬,再次呈奏请准自设公司专办津镇铁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核,奉旨批准。然而随即有德国的强行干涉。“德使不准他人干预山东边界铁路。容路虽议准亦不能办”(张之洞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德不准容闳造山东路。总署改令容闳造镇江至河南路”(同上,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容闳《西学东渐记》,记曰,总署“一惟外人之命是听”,不仅逼令改线,又严令“必招中国资本,不许外人入股,且仅限予(按容自称)六月之期,六月之内若不能招齐路股者,则将特许状取消”。“予既明知此事势有所不能,遂不得已复将此铁路计划舍去”。

当时,汪有龄、张元济分别致汪康年的信中,都曾有专条谈到容闳的津镇铁路计划。

汪有龄,字子建,浙江钱塘人。光绪二十三年冬,受浙江蚕学馆派遣至日本考察蚕务,遂留学东瀛。其时才19岁,是个关心国事、锐志维新的青年学生。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自日本有致汪康年信,提到:“派容闳造清江至京铁路之说,若使确实,其心地材干不知能优于盛杏荪否?闻容久在美国,能不沾染熟悉洋务之习气否?……祈示知。”显然汪有龄尚对容闳不甚了解,继似经汪康年回函作有解释,汪有龄在同年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写道:“中国欲旺商务,其大要首在造铁路、设学堂。今容不惜巨贽、力请办此,其心公私姑不论,其为国家谋也则忠。若果有成议,则添龄一番奢望、一番杞忧矣。”虽对容闳个人品质因不甚了解而仍保留看法,但对其津镇铁路计划则予以肯定,认为是“为国家谋也则忠。”

张元济时在京,任职于总署。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致汪康年函中,联系列强侵逼形势而谈及容闳津镇铁路计划:“近日交涉情形,谨陈其梗概:德因即墨杀彼一兵,上谕又不符所允之言,粤东又有毆抢教士之案,增索沂州铁路,并山东全省商务应先尽德人承办。此事迄未商妥。而昨日又有违言,谓将出京强办。英、俄款皆不借。俄在北方之权日纵,几不胜举。英亦急于图南,并请税司一席嗣后永远用英人,已允之矣。日本偿款,欲与商缓,而彼又不允。法索李约德赔款,至为无理,已给十万佛郎。容闳铁路已奏准。以上各节,务祈慎密,至恳、至恳。”二月二十三日的函中,又有“容闳铁路现有‘改道,避出山东’之议”的专条内容。都是总署秘讯,及时立刻通报给汪康

年。

从上引诸函,可以看到维新派对容闳的铁路、银行计划,一是始终密切关注,二是高度评价,三是热情支持。如陈宝箴“力保容成甫之说于枢府”,特为“电告荣相(按谓荣禄),悬行容说”。据陈宝箴的家信,当时他还亲自起草了《敬陈管见折》稿,准备正式上奏朝廷,请议行容闳的铁路条陈。并将折稿寄给陈炽商酌。又如邹代钧向汪康年建议:“容成甫条陈,公何不录入报中?”邹代钧此建议发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汪康年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时务报》的第九期(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与第十期(十月初一日)上,果然将容闳的《请创办银行章程》、《续拟银行条陈》、《铁路条陈》都予全文刊出,助造舆论,扩张声势。其后,同为维新派主要喉舌的《湘报》,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十六号上,又全文登载容闳的《津镇铁路条陈》,与总署议覆该条陈的奏折以及所奉朱批“依议”的上谕;并在此前后的有关新闻报导中,为容闳此计划因德人蛮横干预而受阻的遭遇代鸣不平。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冬,康梁在海外倡办保皇会,刊印的《保教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中,仍还举此事为国家民族危亡情势的一个显例,说:“山东省犹是我版图,既未割于人,则土地皆为我之土地也,而前年奏准派容闳筑天津至镇江铁路,道经山东,德国不许,改绕河南。路且不许筑,若此犹可谓山东为我所有乎?”

三、容闳参加保国会

容闳《西学东渐记》,于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运动高潮的时期,自记在京参加维新活动情况极为简略,只有一句:“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该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师发起保国会。三月二十七日,在粤东会馆举行第一次大会,其后再会于崧云草堂,三会于贵州会馆。梁启超记首次会议“到会者二百余人”(《戊戌政变记》)。闰三月二十四日,天津《国闻报》刊出《京城保国会题名记》,记有186人姓名,未列及容闳之名。

但据当时也曾莅会的李宣龚,后来给丁文江的信中,则追忆及容闳也是参加者。李宣龚《与丁在君书》曰:“迨保国会发起,弟(按李宣龚自称)虽到过一两次,……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按谓康有为)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按即沈曾植)诸人均在场”。

四、戊戌政变时容闳救护康梁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记戊戌政变前夕,“属谭复生(按即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复生入城后,卓如(按即梁启超)至金顶庙容纯甫(按应谓容纯甫,即容闳)处候消息”;“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又记“容纯甫欲请美钦使,然以其无兵,无济于事,却之。”

曾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的程潜,追述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忽容纯甫来函”致李提摩太,“言政府缙绅四出,梁氏(按谓梁启超)甚危,能为之地否?”(《康南海先生墨迹跋》)

康有为八月中旬出逃到香港后,写信给仍还在京的李提摩太,托请代收康广仁遗骨并交航运至港。同时另有一函写给容闳,也请李提摩太“妥密”转交。康氏在致李提摩太书的笺末写道:“另函致容纯甫者,望代妥密交,各情并告知,此函亦并示之。”(《康南海先生墨迹》)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二、十三两日,梁启超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笔谈时,志贺问到“康先生航英国”的事,梁启超答道:“今有一同志之士,名曰容闳”,“前任驻扎美国公使,乃曾国藩君所任用,后为人所谗免官,寓美国三十余年,曾在美大学校领有政治科博士券者”,“约一月以后即来东京与康先生同航英、美,今康先生欲行之心甚急,已函促其来,来后拟即行”。

当戊戌政变白色恐怖之际,容闳挺身而出,甘冒大险,极力救护已被清廷圣旨定为“首逆”的康梁。真是岁寒知松柏,板荡显忠贞。

五、中国国会会长容闳与维新派

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自立军起义,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最后的高潮。在此之后,历史主动权才渐从维新派手里失去,而转入到孙中山革命派的掌握之中。自立军以“中国国会”(又称“中国议会”)为号召。当时受选举担任中国国会正会长的,即是容闳。

容闳这个会长究竟仅是名誉虚职,还是与起义实务有关?当时维新人士怎样看待处在这个会长位置上的容闳?梁启超、康有为、□存(姓氏未详,仅知其署名作“存”,又尝署作“主”)、夏曾佑及钱恂等人的若干信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这些问题。

维新派筹划自立军起义时,梁启超在檀香山。从光绪二十六年春夏间的梁氏诸函中,可以发现梁氏当时对三件事情曾给予特别的重视,一是拟招募菲律宾的散勇,用为攻占广州的劲旅;二是委托美国人

赫钦往美国筹款,用为起义经费;三是外交方面的准备。

而以上三事,梁氏都曾拟借重容闳去办,并随即向康有为郑重报告提出。三月二十四日,梁氏《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曰:“弟子前书有速纯公来(按谓来美国)之议,某西士(按谓赫钦)亦有一书致纯老,想悉达。兹细思纯老远来,所补有限,某西士之事成否,不系于纯,而先生(按谓康)左右不可无一深通西文亲信之人,以资赞画、备交涉之用,故纯公以勿来为宜。菲岛之事,或劳纯老一行,则甚妙。”四月初一日,再《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曰:“纯老来美,大善,可以为各处保皇会增力。弟子前信因以日内大事在即,夫子(按谓康)左右不可无一通西语之人,故阻其行。今见此次来书,大约去事尚远,能抽暇一来最妙也。”后来“中国国会”用英文对外发布的宣言,也是由容闳撰拟的。

关于自立军起义在外交方面的秘密准备工作,容闳还受康有为委托,办过一件连康门大弟子如徐勤(字君勉)、欧榘甲(字云樵)等都不知道的重大使命,即争取“与港督定约取粤”。这是康有为《致罗璋云书》,写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即自立军起义失败二年之后,才“密告”罗璋云而透露的:“前年(按光绪二十六年)曾托容纯甫、前为美钦使者,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前年不取粤之故为此,不然前年之力取之久矣。此事虽君勉、云樵等亦未之知,不欲宣露,以损办事者之气也。”

康梁密函所涉及的,尚是起义酝酿阶段的容闳情况。□存致汪康年的秘札,则言及中国国会成立之后,起义已进入实施阶段时的容闳。

□存,据诸函中所自述行踪,应是七月初在沪参加“中国国会”之后,七月初五日与汪康年话别于上海杏花楼,初七日抵达扬州。即往还于扬州、镇江间,承负在此地区具体策动武装起义的工作。

□存密札述及容闳者,有七月“十二夕”之函,询汪康年曰:“容、严二公日内有何布置?所发之电,计日当有回音,弟甚盼,乞速示。”

七月十三日,函曰:“顷接湖北来函,本店伙计黄小琴……愿办宜荆(按谓宜昌、荆州)一带下交事宜,唯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仍可由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与渠会同办理。……即盼立复,以便转告小琴,勿延勿误、要紧!”

七月十五日函,再询“议会情形如何”?建议“必本会同入派一干练之员,驻镇江以通扬、沪消息,又宜赶紧编排隐语暗码。又本会筹款之事,究竟曾有眉

目否?此间办事亦复动辄需钱,一发之后,不可中止,非儿戏也。比闻有护送公使出京之朝命,果尔,则议和尚可就绪耶?前电是否有回复?万一未得复,公等此事岂将废于半途耶?前云如不得复,则将另筹办法。所谓办法者,将视北事为转移否?弟心甚焦急,统祈即日详复。如可节次举办,弟此函所言,均须从速,而尤以驻镇江之员为尤亟,因凡事兼可就近会商也。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昨函言黄小琴太守事,望速复为要。”

□存此数函,因是密札,故而多用隐语。“本店”、“本会”,皆谓中国国会。“容、严二公”、“本店正副管事”、“正副会长”,则谓中国国会的正会长容闳与副会长严复。而有关在镇江、扬州一带筹办武装起义的种种“勿延勿误要紧”事宜,或询问“容、严二公日内有何布置”,或“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或“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

历来颇谓“中国国会”与“自立军起义”是两张皮,自立军虽借国会作号召,而国会却只是虚设名义,国会中人未必知晓武装起义密谋内情,云云。但从上引的梁启超、康有为、□存的这些密札来看,作为中国国会正会长的容闳以及副会长严复,恐怕都很难说与武装起义不搭界;只不过参加进去的程度究竟有多深多广,还有待于续为探讨罢了。

夏曾佑,与□存一样,也是在中国国会成立之前,已然参预谋划的“槛内人”。不过,夏曾佑没有出席中国国会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因为他正在安徽祁门做知县官,只是与汪康年始终密札往还不断。其中也一再说担任中国国会会长的容闳。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夏曾佑从祁门寄密函给汪康年,谈到:“国会容首而副以严,可谓得人。(原注:国会章程望见示。)然鄙人恐二公进化太高,不合于天造草昧之事,且下又多必不能合之人,(原注:国会中有几个极难安顿之人,兄以为然否?)须有一种专任作机器皮带之人,始能有济。此种人立极大之功,而不能有所表见,惟仁者任之。二八之讖(按,似借《推背图》语,隐寓“秦”字,当指秦力山,七月十五日自立军大通起义领导者),岂不异哉?”

八月初四日,密函曰:“容、严之举若何?我深为公等忧之。”

八月十一日,密函曰:“容断不能任国会之事。其丁酉(按光绪二十三年)办津镇铁路时,曾熟观其举动,似于支那人情之变化,一切未知者也。至于某某(按宜指康有为)之名一节,弟前曾言,此中有极难位置之人,即指此而言也。然此次尚不过列名,若其人真归,则费事之极耳。……民会魁桀,

六、余 论

必皆旧党，因稍有新者必不能与众相合也。故前所著之论云云（原注：在申所呈者），今日观之，都是废话。总之，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如何做得到？学堂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最有把握，然成本大，收效迟耳。”

夏曾佑对容闳担任中国国会会长，既认为“可谓得人”，又认为“容断不能任国会之事”。夏氏的这种看法，由三方面分析而得来。一是从维新派与民众之间，宏观角度分析，存在着很大差距，“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二是从中国国会及自立军起义，具体指出存在着两大矛盾，即国会领导者的“西学”水平（“进化太高”）与国情认识之间有矛盾（“不合于天造草昧之事”）；队伍内部派系纷争的矛盾（“下又多必不能合之人”，“不能与众相合”）。三是容闳个人领导能力的弱点，“似于支那人情之变化，一切未知者也”。夏氏这个批评，有切实根据，因为在容闳“丁酉办津镇铁路时”，夏氏已“曾熟观其举动”。与容闳曾经“同居几半年”之久的汪大燮，称赞容闳是“所见论洋务者最为朴实”（致汪康年书，丙申九月初二），也同样对容闳有“真不识‘时务’矣”（同上，丁酉二月十一日）的评语。夏氏因此对中国国会与自立军起义，表示深忧（“我深为公等忧之”）。历史已经证明，夏氏的深忧，确颇有见地，相当深刻。

钱恂，受张之洞派遣，在日本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自立军汉口起义遭到张之洞血腥镇压，钱恂闻知后，愤而辞职，说“湖北顽固多多，弟（按钱恂自称）岂能与共事乎！”（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慰问汪康年，说“去秋事（按谓自立军汉口失败）虽危险，然亦颇有味。得与于廿世纪志士之列，岂非大幸！”（同上，三月初七日）并发为愤激之论，说：“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按谓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镇压自立军汉口起义），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胜。欧洲维新，死者数万人，日本亦不少。中国区区死数十人，焉足言新？俄国之所以不得与德、法、英、美比者，以政府不主杀人政策也。近来学生囚三百余人，请看五年之内，俄国必有起色。”（同上，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可知钱恂盛赞容闳等中国国会与自立军起义诸君为“廿世纪志士”，他们的维新改革事业，反动派纵能镇压于一时，却只能更激起志士仁人们的“士气必大胜”。

拙文主要是依据陋见所及的信札等史料。其他方面的史料，因此未予多引。拙文试对戊戌时期容闳与维新派关系的考察，亦仅及若干关系而已。所祈愿的是在抛砖引玉。“引玉”，即盼望学术界能对“戊戌时期的容闳”，予以重视，予以深入研究。因为，觉得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确实需要加强这一研究。

一、容闳《西学东渐记》，自记参加维新活动，殊甚简略。目前有关容闳的论著，说到戊戌时期的容闳，也大都语焉不详。而事实上，即就拙文所录及的信札等史料，也足已看出，容闳对维新运动的关系，不但是自觉、主动的，也不止是积极、密切的，更是广泛且深刻的，他为维新运动出了很多力，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以至在中国国会的成立大会上，出席者 80 多人，没有预提候选人，当场“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会长）姓名”，而举行“投票公举”时，“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出现这样的结果，决不是偶然的。然而我们目前对容闳在戊戌时期的思想、言论、活动，总的说来却仍是知之犹少，这不仅对“容闳研究”而言是个重要的欠缺，即使对“戊戌维新史”研究来说同样也是一大缺憾，亟待学术界加紧发掘新史料，以期能较充分、系统地来描述出容闳与维新运动关系的历史真实全貌。

二、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论述“参加维新运动的派别”时说：“维新派内翁同和系、假维新系、严复系、康有为门下的麦孟华系都属右派；康梁系、容闳系属中派；谭嗣同系属左派。”认为有一个“容闳系”，是属于“维新派内”的派系，而且是可以与“康梁系”并列，而为“维新派内”的“中派两系”之一。但后来，史学界研究维新运动，逐渐把容闳（更不必提“容闳系”了）从“维新派内”划了出去。近年来，则似乎逐渐又有划进来的趋向。究竟容闳在维新运动中有没有、以及有着怎样的地位？究竟“维新派内”有没有一个“容闳系”？这其实是“戊戌维新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老”问题。问题提出了几十年了，又经过了大反复的曲折，时至今日，或许也该是予以明确实在的回答的时候了。当然，要能真正回答得好，需要的还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认真深入研究。

三、维新人士们对容闳的看法也不尽一致。非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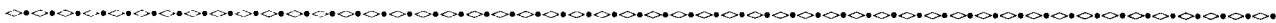
各人彼此间的看法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对容闳的看法也会有褒扬同时又有批评(如拙文所引汪大燮、夏曾佑等函)。在中国国会中,“容(闳)与汪(康年)不合拍”;“容本来与康(有为)关系较好,因此,汪康年一派厌恶他的袒护康”(《井上雅二日记》)。不过,容与康梁在思想上也非全然合拍。如自立军起义筹办过程中,康有为“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梁启超则“始终不欲弃此义”,与其师剧辩。而同一个问题,梁同时又与容闳争辩。梁说:“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纯甫难是说”。梁反驳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因为梁认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德政教其祖母也”,自由之义即由此源而来(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容闳后来与康梁渐脱联系,而转向与孙中山革命派的合作,这其中,固然主要有容闳本人爱国思想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进步的原因,但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还在自立军起义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曾对康党包括康有为本人的搞“权术”、搞“同门”小圈子的“手段”做法,深致不满。康党对于容闳,也明显有过玩弄权术手段的迹象。当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为着公开的舆论宣传的需要,如康有为起草的《驳后党张之洞于荫霖伪示》,对参与起义的容闳仍作高度赞扬,称为“通达英杰之才”、“忠义通达之士”,“愤于

君废,忧于国亡,故发愤舍身破家而思救主救国”。而另一方面,为着向捐献起义经费的海外华侨交代起义失败、“大款涂地”的原因,“令各埠释然”,康有为又推卸责任而转推到容闳及孔马哩(今译名为威马里)等身上去。康《致谭张孝书》(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说:“孔马哩未知内情,其说不可行。凡外埠之人亦不知内情。……即孔马哩已费数千,而未收分毫之用。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孔马哩及容纯甫辈皆纯乎西风,开口辄问我会(按谓保皇会)千数百万,某军械宜买几百万,某轮船宜买几百万,不知我会大如蚊血,小若蚊旋,即汝所经各埠所捐,多则千数,小乃数百。以众蚊之血而供大象之一啖且不足矣,如孔马哩所言,不类乎梦话乎?”康党这种“权术”、“手段”,依容闳率直朴实的性格,必难以接受,也会因而给双方关系投下阴影。

凡此种种,容闳在其爱国奋斗历程中与诸多维新派人士结下的种种纷繁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各种前后变化发展,尽管我们还未能全面了解得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倘将“容闳与维新派的关系”作为一个典型个案,确乎极具代表性,极富典型价值。若能予以更充分、仔细、透彻的剖析,必将可以促使对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进步过程、近代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们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程等方面的整体研究,也会达到更深化的认识。

如此区区愚见,即充拙文余论,抛砖引玉吧。



(上接第 19 页)和佛山等城镇的兴起,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生产分布的地域分异。这样,由于位于珠江口西侧,强烈的沉积作用使得澳门周围浅滩广布,淤积现象严重,作为一个浅水港口,不能适应产业革命后的汽船时代的需求,因而其国际贸易大的地位为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香港所取代。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澳门发展了特殊行业“博彩业”,并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支柱,无疑也是得益于其与香港邻近的地理位置。没有香港提供的大量客源,澳门的博彩业不会如此兴盛。不仅如此,现代澳门经济的复苏,工业的迅猛发展也与香港在澳门的大量投资不无关系。今天,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澳门的回归也指日可待。粤港澳空间和经济的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以穗、港、澳为核心,以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江门、惠州等城市为节点,通过各种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相互作用与转化,不但可形成高度发达的珠三角经济网络系统,而且可推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的全面协调和

稳定发展,澳门也必将在这一过程中踏上新台阶,揭开历史新篇章。

注释:

- ①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后序》。
- ②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三,《险要》。
- ③④⑤⑥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
- ⑦祝淮:道光《香山县志》卷四,《海防》。
- ⑧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出版,1995 年。
- 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
- ⑩《大明律》卷一,名例。
- ⑪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
- ⑫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形势篇》。
-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 ⑭⑮转引自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出版,1994 年。
- ⑯转引自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第 141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 版。
- ⑰转引自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
- ⑱汪懋:《澳门杂诗》第 3 页。
- ⑲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蕃附篇》。